

# 文学认知的独异

塞缪尔·韦伯/文 苏岩/译 郭佳/校

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文学研究的变化发展，可以发现两种相互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又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方面，从研究领域和方法论两方面来看，文学研究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性别研究，酷儿理论，族裔和跨民族研究，现在还要加上世界文学，这些都堪称文学研究新进展。另一方面，文学研究在扩界的同时，关于什么构成了研究对象特定的文学维度这个问题，人们在观念上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变。当我开始上研究生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诗歌即使不是所谓的“文学”之本质，至少构成了它们的核心。那时候很多最具有影响力的批评处理的都是诗歌文本。相反，今天当文学系的学生谈论他们所学的专业的时候，他们通常把“文学”等同于“叙事小说”。就在学生中间引起兴趣而言，第三种主要的文学“文体”，戏剧也已经排在了诗歌之前，尽管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戏剧还是远远落后于叙事作品。“文学”概念从诗歌到小说的转变促进了文学研究的拓展，使文学研究进入到了之前不能进入的领域，与此同时，与此同时，这种转变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是什么将“文学”与其他的人类活动区分开来？这些人类活动并没有把文学分立出来，而是将它纳入“文化”、“历史”和“地缘政治”的更广阔范畴中，毫无疑问，文学本就属于其中。文学研究的扩界是为了合法地回应迅速变化的世界，但如果不考虑上述问题，这种扩界就有这样的危险：它虽然得偿所愿地为社会所接受，但却不能提供真正独特的东西来回报社会。

文学研究所试图回应的社会变化很多也很复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已经遍布生活的各个领域，尽管它带来了很多变化，但是它往往提升了视觉和听觉经验的威望，却牺牲了图像和语言媒介，后者对文学而言仍然有决定作用。过去几十年短信和社交媒体以几何指数增长，尽管其中包含了写作和阅读的实践，但似乎并没有为它们带来新的尊重。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更加迫切地要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独特资源和可能性作出理解性的反思。下面的评论试图提出一个对这一挑战的初步的，试探性的和不全面的回应。

## 一、独异:闪灵（shining）的能指

我想从这一点开始，将文学与人文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正是它所生产的知识的独异性质。文学研究中的知识具有不同于多数其他学科的知识独特地位和作用。文学研究中的知识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这和其他多数学科有所区别。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它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与文本相遇的结果，这种相遇既是独异的也是情境化的，而在其他大多数学科中，知识通过普遍化以超越自身所产生、传播和接受的具体情境，其价值正是通过这种超越具体情境的有限特征的能力来衡量的。换句话说，我想指出，当然这种说法也有过度普遍化的危险，在大多数学科当中文本被看作是为一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这个目的可以和作为手段的文本很清楚地分开——文本的意义中包含了目的。相反，在文学研究中重要的不是意义本身，而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意义的呈现方式——他借用了经院哲学的一个术语：重要的不仅是语言说了什么，而且是它如何说。美国作家阿奇巴尔德·麦克利施（Archibald MacLeis）有一句著名的诗，“一首诗不应该意味着什么。它只是存在（A poem should not mean. But be）”。和许多著名的格言一样，这话太简单了。太简单是因为和所有的语言一样，意义在诗歌中就像在其他语言中一样起作用。但是诗歌——或许说得更普遍一点是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存在（being）从来不能被简化为符号内容。

德里达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它重述了上述观点并且把它扩展到一般的思考中。这个说法出现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中，就在德里达对索绪尔的阅读的最后。在谈到索绪尔对“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区分——这也是从中世纪经院主义那里借来的——的时候，德里达这样总结他对索绪尔的解释：

认为所指最初并且本质上就是痕迹，认为它过去一直处于能指的地位，这显然是天真的主张。根据这一主张，关于逻各斯的形而上学，关于在场与意识的形而上学必须将书写作为它的死亡和它的根源来反思。<sup>1</sup>（楷体为我添加——萨缪尔·韦伯）

---

1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英译，巴尔迪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1974），第 73 页。中译引自《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5 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尽管表述这种观点的用词看上去可能有点过时，我还是想指出，它的意义至关重要并且和我们今天对文学研究的追问有关。为了开始理解这些意义，必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能指如何能够并且必须“一直处于能指的地位”？第二个问题，书写如何同时又被看作是“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死亡和它的“起源”？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思考翻译问题。索绪尔和德里达一样都用法语写作。我用英语跟大家说话，并且我用的也是他们作品的英译本。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翻译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事实证明，翻译确实是证明索绪尔作为意指过程的语言概念的一种方式。能指把自己和其它能指区分开来，能指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意义（signify）——它们是一种否定性（negative）的翻译。不过我在这里打算讨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在英语里世界里大家对这种翻译如此熟悉以至于多数说英语的人和读者根本不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我指的是对索绪尔所用的一个法语词的翻译，*signifiant*，英语是 *signifier*。在法语中，这个词是动名词，也就是由动词的现在分词构成的名词。“阅读（Reading）”，当我们把它用作名词的时候就是动词阅读（to read）的动名词，但是当我们把它用作动词的时候它就是现在分词。不过，现在分词是一个非常特殊——或者我更愿意说成是非常独异的语法现象。它表达了一种不同于上面引文中德里达所指的“在场与意识的形而上学”的存在模式（a mode of presence）——正如现在分词不同于现在陈述语气（present indicative）一样。现在陈述，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意味着那些可以被指向的事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事物必须在它们的定位中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相反，现在分词也正如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是分开的——由它所意指之物和意指过程的裂隙自身所构成。现在分词的出现通常是通过它与发音或者表达的同时性来定义的：我现在正在这里跟你们用英语说话（speaking），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我说（speak）英语。但是，这种同时性并不能产生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反，它带来了一种必然的分裂（separation）。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必须是分裂的。它的出现由一个裂隙构成，这个裂隙又再生产了所指与意指过程（signifying）之间的一般关系，而且它先于这个关系而出现。“所指（signified）”是过去分词，同时也是过去完成时：它指的是那些已经完成之物。它属于过去。一般来说，它要么被视为意指过程的起源，要么被视为意指过程的产品，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它都是意指过程明确的界限（defining limit）。能

指在所指中发现了自身的确定性 (determination)。作为已经完成和终结之物，给它加一个定冠词看上去是足够合适的。因此在英语中介绍和使用“所指 (the signified)”这个术语是相对简单的。

不存在没有能指的所指，反之亦然。但是这种相互依存很容易掩盖这两个作用 (operations) 之间非常不同的特质。当我们在英语中使用动名词的时候，这种区别就出现了：和“所指 (signified)”不同，“signifying”前不能加定冠词。这是因为意指过程 (signifying) 需要一个反复的、持续不断的和非连续性的系列表达，这些表达逃离了它的直接显现或者固定位置，并且走向某种不同的东西或者地点。回想一下麦克利施的说法，它“表达意义 (means)”而不“存在 (is)”。但是从索绪尔式的或者德里达式的视角来看，它所意指的东西并不是一个所指，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表征

(representation) 的封闭性意义。它指向别处，但是却没有改变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反复的运动，现在分词是通过参考其发音而确立的，它没有一个自身封闭和完整的内在原则。因此它需要某种外部干预，某种中断，来达到一种相对稳定和静止的“所指”状态。从意指过程到所指的运动从来不是纯然内在的。换言之，这一运动所固有的东西从来就不是纯然固有的：它是异质的。这就是为什么单个的词从来不能通过参照其“内在的”意义来被完全定义，而只能通过“语用”、“语境”及其语法位置来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语用可以通过常规、惯例约定俗成，从而变得自然。之后它就会变得多少有些自明，就像一般的名词一样。但是这个自然化的过程从来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和稳定的，这一事实可以用一个事例来说明。索绪尔的第二个英文译者，罗伊·哈里斯没有选择用“signifier”来翻译“signifiant”，而是用了“signal”，他也没有用“signified”来翻译“signifie”而是用了“significance”。这样，他就在两个术语——特别是“能指 (signifiant)”——和它们的源动词 (signifier) 之间拉开了距离。<sup>2</sup>

---

2 哈里斯的翻译说出了两个术语间的不对称——“signification”指的是一个过程，而记号 (signal) 指的是一个整体——它同时也在语法上掩盖了这两个术语间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两个术语在法语中还保存着单数动词的形式：signifier，即表达意义。“示意” (to “signal”) 也与“意指” (signify) 非常不同。参见：费尔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Open Court: Chicago/LaSalle, IL, 1983), xi. 拉康对符号 (sign) 的研究也适用于记号：“一个符号 (sign) 对某人来说代表了某物，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来说代表了一个主体。” (雅克·拉康,《文集》 Ecrits, XXX)

想要理解对动词的接近可以有多么糟糕和不恰当——特别是在学术话语的语境当中，想想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在英语动名词前加定冠词这一用法中，近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斯蒂芬·金的小说《闪灵》（*The Shining*）了。现在这部小说已经成了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一部有名的电影。<sup>3</sup>题目当中的神秘因素反映了现在分词的神秘性，特别是可见性状态的神秘性。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一般而言和在现在分词中也一样——你看到的根本不是你所得到的。并且你所得到的也不总是你所看到的：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作家（在电影中是杰克·尼克爾森所扮演的角色），他唯一的写作就是像着了魔一样地反复打着一句老掉牙的话，“只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在现在分词中，“玩耍”有点太多了以至于让人无法适应。[这也就是为什么斯特里奇（Strachey）在翻译《诙谐与无意识》（*Wit and the Unconscious*）中弗洛伊德重述的笑话时小心翼翼地避免了使用现在分词，而是用未完成时代替，从而把笑话变成了故事并且使其丧失了引人大笑的“笑点（punch）”。把“意指（signifying）”视为一个名词，仿佛它指称的是一个稳定的、明确的过程，这样看待“意指”就产生了方法问题——这个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sup>4</sup>，即从本质上难以界定的差别意指活动（play of differential signification）是以何种方式被捕捉、中止和凝结的，这样它就可以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提供了一个确定的认知客体。不过对于现在分词来说，这样的认知状态和它的客体一样都还是不稳定的，这也反过来产生了对认知主体同一性（identity）的质疑。]尼克爾森不停地打同样的句子——指向他的角色和他自己的名字，杰克（杰克·尼克爾森的杰克）——既暗示了他的焦虑也暗示了一种与现在分词有关的困境：“闪灵（Shining）”并没有产生稳定的“光（shine）”。外在现实和电影虚构融合在了杰克这个名字当中，它反过来又反映了在作为电影标题的动名词中外部和内部的融合：总的来说，这部电影就是“闪灵”，它表现的是和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不同的东西。

---

3 库布里克的第一部未删节版故事片的名字也是一个动名词：《杀戮》（*The Killing*），是库布里克和吉姆·汤普森根据一本原名为《一刀两断》（*Clean Break*）的小说改编的。不过，界限由于使用了动名词而从来没有“划清”，反而始终多少带着一些暴力，因为它是强制性的。

4 说它是政治的，是因为这里涉及到边界设置和维持的问题——对我而言，这正是政治的核心功能之一。但是如果这是政治问题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异质的，因为它的原动力一定来自于外界，然后才可以划定疆界。

对于被认为是意指 (*signifying*) 过程语言来说也同样如此。现在分词或者动名词, “le signifiant”——字面意思就是意指过程 (“the signifying”)——是一个最准确的表示表意过程 (the process of signification) 的术语, 索绪尔把意指过程作为语言的动态成分。索绪尔认为, 语言首先要意指事物,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从外部来给事物命名。并且他强调说, 意指不同于表征,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划界或者区分的过程, 这个过程与外部的所指之物 (referents) 无关, 它所涉及的是其它的能指 (signifiers)。因此他认为从语言学上讲积极意义在于能指的差异活动。或者说“意指过程”的差异活动。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对试图用“词”作为基本元素来建构一种语言理论的传统做法如此怀疑的原因。但是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不能够成功地建构起那种他非常想要建构的综合性的或者系统性的语言学理论。因为如果现在分词的名词化, 即动名词——就像在“意指” (“the signifying”) 或者“闪灵” (“the shining”) 中一样——清楚地表明了语言作为意指的基本过程, 它赋予语言以一种幽灵 (spectral) 品质, 使得意指过程的显现 (apparition) 具有了幽灵般的 (ghostlike) 特质。<sup>5</sup>在这样的语境下, 它使人想到了《闪灵》中丹尼·劳埃德实验的杰克·尼克尔森的儿子, 他有着超自然的能力能够在尼克尔森及其家人所生活的闹鬼的房子里看见鬼。就像意指过程一样, (海德格尔所谓的) 语言之家也仍然在闹鬼。意指的幽灵般的 (ghostlike) 品质使语言不仅成了表象 (appearances) 的中介, 而且成了幽灵显现 (apparitions) 的中介。它还表明德里达如何以及为何把“书写”——因为它可以被看作这样的意指过程的典型——同时描述成“形而上学的在场”的“死亡”及其“根源”, 它一丝不苟地致力于把生命与死亡、在场与缺席区分开来, 好像它们是互相排除的对立之物一样。如果语言的在场作为“所指”总是存在于它“总是已经占据了‘意指’的位置”的话, 那么生命与死亡就不能以这种方式被分开。这让语言获得了一种神秘的性质, 这种性质对某些人而言并不舒服。

那么, 如果我们想一下德里达所说的现在分词和现在陈述式之间——“意指”和“是”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可以说语言总是在它之前就“是”其自身了, 而且始终跟在它的后面——就像卡夫卡的故事《家长的忧虑》 (*Sorge des Hausvaters*) 中

---

5 萨缪尔·韦伯, 《索绪尔和语言的幽灵》 (*Saussure and the Apparition of Language*), 《现代语言笔记》卷 91 (*Modern Language Notes*), 1976, 第 913-938 页。也参见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 (*Specters of Marx*), Peggy Kamuf 英译, 罗德里奇出版社, 1994 年版 (Routledge: NY and London, 1994), 到处可见。

奥德拉戴克（Odradek）身后的线头一样，一直滚下楼梯。<sup>6</sup>就像索绪尔用一种语言学家的更为冷静的话语所指出的那样：“在最终的分析中，一个词的内容不是由它所包含的东西而是由存在于这个词之外的东西所决定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4页）。但是这个“外部”是如何被定义和限制的，特别是如果它必须不仅被看作是空间上的外部而且还要被看作是时间上的外部的话？“存在于词语之外”的东西不仅是特定时期我们所谓的一门语言中的一些数量的词语——退一万步来说（*concesso non dato*），就算我们假设这样一个“时期”自身可以严格地界定——而且还牵涉到不可胜数的词语和构词成分之间的组合和分解，任何一个单词潜在地和这些组合和分解有关。就像现在分词，一个单词的“外部”或者他者并没有闭合的内部原则。它实际上是不可限定的，因而也是不可预测的。或许就像本雅明所引用的那句卡尔·克劳斯的那句著名的评论：“人看一个词时离得越近，词回头注视的距离就越远。”<sup>7</sup>

如果承认在作为能指的一切意义建构中，意指过程有不可化约的效果，那么承认这一点的人就只能处在回应的位置，而不是模仿的位置，更谈不上什么“创造”了。这极大地改变了阐释“主体”的方式。读者被文本——一个由诸种文本所组成的多种多样的文本之网所吸引，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是，无论是就这个词的语法意义而言还是就其哲学意义而言，他或她都不是文本的“主体”。读者既不是一部作品的作者也不是一个动作的发出者。读者像被压抑的意指一样对文本作出反应，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应文本。读者是回应者，但是文本也是回应者。文本是被压抑的意指过程，因为它回应着其它文本，那些写出来的和没写出来的，被遮蔽的和可见的。它呼吁读者做出进一步的回应。所有这一切都在它幽灵般的（ghostlike）外表下被冻结了。这一冻结不可避免地要选择某些意指可能性来作为能指，并因此拒绝其他的意指可能性。这种在诸回应之网中选择和排除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所产生的知识也仍然是局部的，只是在那个词不同的意义上：不是整体的（total），而是片面的（partisan）。文学知

---

6 “他将来会不会带着拖在身后的合股线咕噜咕噜地滚下（*kollern*）楼梯，一直滚到我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脚前呢？”《家长的忧虑》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约写于1917年夏天，后来收入1919年出版的《乡村医生》。中译本引自《卡夫卡全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译注

7 卡尔·克劳斯：《为了家园，为了世界》（*Pro domo et mundo*），慕尼黑，1912，第164页，引自瓦尔特·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GS版文集卷1，第647页；英文版选集卷4，第354页。此处采用张旭东先生译文，《启迪》，三联书店版2008年版，第207页。——译注

识应该比其他学科更能够意识到这种片面性，因为它的构成接近于作为局部-片面反应的阅读过程——这本身就与观察、测量和计算区分开来。

然而对于文学研究而言，这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它所关注的文本的意义既取决于它们言说、宣称或者提出了什么（比如它们的命题、主题或者表现的内容）也取决于它们是如何从语言和图像的角度被安排的。对文本的批判性阅读所产生的知识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声称自己具有同样的永恒性或者持久性——甚至是预言性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强阅读”和“弱阅读”的说法得以暂时流行的原因。释义（rephrase）就是一种弱阅读：它也许能够恢复文本的内容，但只能通过忽略意指过程来达到这一目标，而内容正是通过意指过程得以表达的——弱阅读在表明它“总是已经占据了意指的位置”的同时，也将内容相对化了。尽管每个人都承认有一些回应比另一些更好（尽管对哪些回应更好这一问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内容永远在表达的意义，绝不是一个需要单一的或者确定的答案的问题。但是，人们也许可以制定一个普遍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可以判断这些回应的价值。一个更好的、更具有生产性的回应将会激发出那些具有独异特征的向度，这些向度被排除在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解释之外，同时排除这些向度的因素也被激发出来，正是它们让排除变得不言而喻。。这样的回应能为做出其他阅读扫清障碍，因此可以通向与过去不同的未来。

与过去不同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它打开了通向新经验的道路。消极的一面已经被德里达简洁地总结为：“独异的经验无法与其损失分开。”<sup>8</sup> 我要补充一点，它不是不能与实际的损失分开，因为独异之物作为唯一的的东西从来不能这样被“拥有（had）”——它也不会失去。但是它不能与一种丧失的感觉分开，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再生产、重复和再认知的过程来认识它，这个过程只能通过改变它来使它成为可理解的。独异之物从来不是这样用直接的方式就可以接近的，因为它不是按照完全相同的方式可再生产的。因此它不能为我们的认知所理解，但是它并没有逃出我们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是独异之物一样，从来不只是属于我们的：它从来不仅仅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我们通常把感觉想成某种内在的、主观的、私人的东西，但是这个词本身却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东西：它表示一次与外部的擦肩而过（brush），外部和内部相遇（converge）却不会融合（merge）在一起。它涉及到一些

---

<sup>8</sup>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xx。



我将要说的一种摩擦 (*friction*) 经验, 这里我用了一个英语中很少使用的词。小说作为摩擦, 作为不同表面的相互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意指的独异经验似乎需要的是摩擦的感觉而不是认识 (*knowing*)。我们不能去设想独异之物, 更不要说去触碰它了, 这一事实可以增加其影响的强度。在说到审美理想所产生的快感的时候, 康德 (在《判断力批判》中) 一再把它描述成一种激活了认知力的感觉——即使它从不提供任何实际的认知, 准确地说, 它是通过使那些力和他所谓的“不可言说” (*the unnameable, das Unnennbare*) 的东西发生联系来激活认知能力。康德意义上不可言说的东西并没有把名词和名字排除在外, 但不可言说之物从来不会清楚明白地或者用最终地为事物命名。正是这种不可言说之物激活了精神——通过刺激它进一步思考——和感觉。这里的感觉和思考绝不是不相容的, 但思考没有绝对的权威 (*the last word*), 因为 “last” word 并不是最终的结论, 只是最近说的话。这样的思考增强了那种活着的感觉, 准确地说, 它感受到了自己的局限, 自己的灭亡增强了那种感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它把诸可能性当作可能性来感觉, 而不是把它们作为实际的客体来认识。这样的感觉和独异的身体有关, 这个身体是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轻轻擦过而不融合的地方。这个身体是一个表面的身体: 它既是肤浅的也是遭遇所有异己之物的地方。能指指向一个所指, 一个意义, 而不是完全被后者所吸收, 它还保留着某种物质性的或者身体性的特征: 它并没有消融在意义的精神性之中。

这使得阅读有了一种更强烈的活着的感觉, 一种被卷入到时空中的感觉。这种生命感觉也和分离的感觉、无常的感觉紧密相关。因此, 它限制了自我——自我确证的意识——因为自我想要超越时间保持永恒。相比之下, 审美愉悦中的自我意识——对康德而言, 这种审美愉悦始终来自与彻底的独异经验的相遇——(这种自我意识) 只有在背离中, 在脱离自身中才能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因而可以说, 它只在消失中存在——也就是说, 既是意指, 也是“闪灵”。

## 二、科学中的独异/奇点 (*singularity*)

和鬼魂一样, 这样一种强烈的感情的幻影必须始终是局部性的 (*localized*)。不过, 它的局部性是独一无二的, 这最终意味着它是不可接近和不可理解的。它始终依靠语

境，但是语境始终不能穷尽其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记住另一个语境，在这个语境中科学也同样使用了独异（singularity）这个概念：在数学中，在天文学和计算机科学中。雷·库茨韦尔在《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中给出了这样描述这个术语的发展：

为了对奇点概念有进一步的认识，让我们来探索这个词本身的历史。起点是一个英文单词，表示具有独异影响的独特事件。数学家用它来表示超越了任何限制的值。如果除以一个越来越接近于零的数，其结果将激增。<sup>9</sup>

这个描述追溯了这个词语从日常语言向科学话语的迁移，其中的关键词之一就是“超越”，它在副标题中也出现了一次：当人工智能超越人类。至少在库茨韦尔的使用中，独异/奇点代表了两种东西：首先是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到来，它当然意味着某种和之前出现的所有东西根本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支配着最初构想的意识，库茨韦尔把它归功于约翰·冯·诺依曼：

技术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我们将朝着某种类似奇点的方向发展。一旦超越到了这个奇点，我们现在熟知的人类社会将大不相同。（库茨韦尔，第 10 页，中文第 2-3 页）

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样，库茨韦尔把独异描述为一种与根本的异质性相遇的结果，这是与一种完全与我们现有知识不同的现象的相遇。而且再说一遍，它有点像康德说的“数学上的崇高”。它作为一种“绝对的大”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能力，独异之物的数学概念也力求超越可计算性的限制：就是去思考那些不能被直接感知或测度之物的努力。<sup>10</sup>

---

<sup>9</sup> 雷·库茨韦尔：《奇点临近：人工智能超越人类》（*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企鹅出版社 2006 年版（London：Penguin, 2006），第 22 页。中译引自《奇点临近：当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 页。——译注

<sup>10</sup> 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第 25 节。

在数学物理学以及哲学和文学批评话语中，“独异”的概念可以指可知之物的界限，在科学话语中通常和“事件穹界”（event-horizon）<sup>11</sup>这个术语相联系。天文学中的“黑洞”的发现或许已经成了“独异”概念意义最为深远的显示：

人类历史中对“奇点”的使用如何能够和物理学中对这个词的用法相比？这个词是从物理学从数学中借来的，这是种都显示出一种对于拟人化术语的偏爱。在物理学中，奇点在理论上表示一个零密度的点。它具有无限的质量密度和无限的重力，但是由于量子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并不存在无穷大密度的点，事实上，量子力学也不允许出现无穷值。（库茨威尔，第 486 页）<sup>12</sup>

库茨威尔这里说的“量子的不确定性”暗示了海森伯格著名的“测不准原理”，这一原则将强大的情境不确定性因素引入亚原子粒子的实验知识当中。正如海森伯格在 1927 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说：“（亚原子粒子的）位置越精确，那么此刻它的动量就越难以确定，反之亦然。”根据海森伯格的说法，如此不精确的粒子路线的确定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观察-实验缺陷，而是量子物体本身的性质，它可以被确定被预测。从数据上看，要么是它的位置可以被确定或者被预测，要么是它的动量可以被确定或者被预测，但两者绝不可能同时被确定。这导致他提出了另外一个非常激进的说法：“‘在尖锐的因果律陈述（也包括断言）中，如果能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测未来。’——这个说法错的不是结论，而是前提。”

换句话说，海森伯格质疑的前提是这样一种假设，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亚原子粒子的“现在”。但是如果不能准确地知道现在，那么同样也就不能预知未来。他这一观点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我们不能准确地了解现在是因为我们不能假设，现在的时间之维和空间之维能够被统一在一个一致的、连续的或者不可分割的现在之中。毋宁说，亚原子事件的“现在”和现在分词一样，分裂成了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这两种可以测量的“现在”并不一致，由此产生了结果的不确定。必须指出，海森伯格说的

---

11 事件穹界（Event-Horizon），物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时空的曲隔界线，指的是在这个界线以外的观察者无法利用任何物理方法获得事界以内的任何事件的资讯，例如在黑洞的边界以外观测不到边界以内的任何事件。——译注

12 中译引自《奇点临近：当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7 页。——译注

表示“测不准原理”的德文词比英文翻译更为生动形象。他称其为 *Unschärferrelation*, 字面意思就是“不清晰的关系”，因此它使人想起测量的视觉方面，并且将某种不透明性置于未知之物的核心。

诚然，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并不仅仅是把不精确性引入了科学测量中，就像最近一个对它的解释所承认的那样：“必须注意，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并不是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相反，当我们测量亚原子事件的时候，它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不确定性的界限在哪里。”<sup>13</sup>

如果这一评论成立的话，海森伯格的发现的意义就是通过考虑可知之物的界限来更好地测度它。对于诸如模糊性或者不可决定性等批判性概念也可以作类似讨论：在感到没有必要为文本赋予统一意义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更为准确地呈现文本的裂纹、冲突和文本保持开放的可能性。从术语上讲，这可以表述为意指 (*signification*) 和意义 (*meaning*) 之间的差异。如果后者被理解为完整的和自我包含的，那么前者就始终包括一个无法完全确定的断裂。不过，在两种情况下，审视或者阅读的“客体”，都不能被认为是独立于审视过程而独立存在的，不论这个过程是作为测量还是作为阅读。确实，还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区别。科学测量为可计算性分配了一个位置，这种可计算性在语言能指的解释中没有准确的对应，即便解释模式也可以实现一定的形式化。

正是由于这种形式化的重要性，可计算性可能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是与语言、文学和甚至诗歌完全不相容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在科学话语中有一个术语，它把自己作为这些讨论——它们也许适用于表示文学批评阅读中的那些带有独异特征的知识——的结果。这个术语就是“事件”，如同你在刚刚引用的段落中所看到的那样，特别是在有关独异/奇点的地方，它作为量子测量的对象开始取代“粒子”的概念。

关于科学上对“事件”一词的解释能否进一步和文学文本的阅读相比这一问题，我只能留给那些更有资格讨论这一问题的人来讨论。我的怀疑是，阿尔卡迪·普罗特尼斯基 (Arkady Plotnitsky) 所谓的“可知之物与不可知之物”<sup>14</sup>的相互作用在文学研究中必须为各种形式的误解——尽管这些误解并不适用于科学，在科学中，认知越来越

---

13 <http://www.aip.org/history/heisenberg/p08c.htm>.

14 阿尔卡迪·普罗特尼斯基：《可知之物与不可知之物》(*The Knowable and the Unknowable*)，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依靠测量和预测——留出一些专门的位置。至于文学，就像心理分析一样，错误的交流也可以被解释为交流和传达的一种形式，而非相互之间的排斥。在文学阅读中，错过目标可能比达到目标更有意义。

### 三、《项狄传》<sup>15</sup>：“新奇的结论”

现在让我来为诸位举例说明文学和文学批评如何能够重新思考独异与一般、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的例子来自于斯泰恩的小说《项狄传》，这部小说深刻而长期地展示了小说的境遇，小说写作既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过程（process of calculation）也是一个作为误读过程的阅读过程。

斯泰恩的故事，既是对自己作为叙事的本质的不断“反思”（这种反思不是以康德的“反思性判断”概念来进行的），又是一项对独异之物的研究：瓦尔特·项狄、托比叔叔和所有对其他人物，包括对叙述者本人特里斯坦的描述都是如此。小说的开头——特里斯坦最开始（ab ovo）被怀上的情形<sup>16</sup>——和小说的结尾一样新奇和独异。由于叙事限制和叙事中人物和事件的限制总是不像它们看上去那样：既不是个体的简单再现，也不是事件的简单再现。毋宁说，在结构上它们被区分开来，就这个意义来说，它们是独异之物——它们不仅与他者区分开来——如同索绪尔的“能指”——还最终与自身，也就是说，与其自我意识区分开来，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的行动不是出于深思熟虑的、自觉的动机，而是出于他们的妄想，出于他们对那些超出他们控制的力量和事件的反应，小说中提到，这些反应是针对小说中所谓的“玩意儿（hobby horses）”的，精神和身体的强迫性习惯导致他们沿着几乎没有什么力量的方向和道路前进。即使他们遵循了那些可以重复的模式，它们也从来不会成为一个整体。

故事只是在开头和结尾——至少不是在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意义上——使用和遵从了这些模式。毋宁说，故事不断被打断，从经验层面来说是由于作者的死亡，但是整体上也是由于那些事件。这些事件证明，其中的“玩意儿”是对冲突的反应，他们

---

<sup>15</sup> 《项狄传》，18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斯泰恩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和叙事者是特里斯坦·项狄，但是全书的主要内容是在叙述主人公的父亲和叔叔的故事。中译本引自《项狄传》，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译注

<sup>16</sup> ab ovo，拉丁文，从卵子开始；即从头说起。罗马诗人、批评家贺拉斯（前65—前8）在《诗艺》中第146行赞赏荷马并没有从勒达的卵子（即海伦的出生）开始描写特洛伊战争的起因，而是将读者直接引入故事的中心。——译注

力图避免那些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小说自身以妙语连珠的笑话结尾，这个笑话是针对小说的，更准确一点说，这是跟读者期待开的一个玩笑，在读者的期待中，小说能够并且也应该是关于一个有意义的个体生命的故事。但是小说的题目已经宣布要挑战读者期待了。小说的题目不是特里斯坦·项狄的生活和时代（*Times*），而是《特里斯坦·项狄的生平和见解》（*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这是一个如此这般的时代：那些可以被称为个体的生活的东西并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一些关于生活的意见（*opinions*）。“所指”已经替代了“能指”，或者说意指过程

（*signifying*）。我们应该看到，结果便是小说成了摩擦性的（*frictional*）。因为读者并不是简单地对虚构的陈述作出反应：通过他们习以为常的、约定俗成的期待，他们不仅回应了叙事，而且还帮助建构了叙事的意义，叙事就像在日常对话中一样以浅显直白的方式传达给他们。正是在对话中误读才成了生成新的理解的出发点。

这就是为什么叙事要不停地打断那些看上去是它的发展进程的东西，这样才能为读者共同的建构性反应提供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小说将会朝着建构一个完整、和谐的人生故事的方向前进。但是这从来没有发生过。叙述者把自己的故事说成是必然要“不断前进和离题”的，其中众多的离题构成了阅读的“核心和灵魂”。然而，他们通过挑战读者的习惯性期待来这样做，读者都希望故事的结尾会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就像商业账簿中的最终效益一样可以使得读者对利润和损失一目了然。小说却并不是如此。小说用一个非常“新奇”的结尾打破了读者的期待。小说以所谓的“鸡和公牛的故事（a cock and bull story）”结尾——这个无稽之谈就是要跟对意义的期待开一个玩笑。但是，它这样做的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简要地重复小说的某些部分。

在这部小说中，个体的生活力图将独异吸收进一个有意义的、有限的整体之中。特里斯坦·项狄说明，个体生命已经是独异的、分裂的和局部的，并且已经波及到了它的前辈们——和那个家族：项狄家族也是断裂和脱节的。但是这也显示出，这一断裂可以产生新的意义和重生（*afterlife*），其中必然会包括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反应。

但是为了理解重生的意义，我们首先必须回忆一下“生命”在这部小说中的一般表现方式。对父亲、子嗣和生育的持续追问——换句话说，就是对个体生命如何产生和再生产的追问——贯穿了这部小说的始终。这些追问在暗示，瓦尔特也许并不是特

里斯坦真正的父亲，私生贯穿了整个项狄家族的历史。但是最重要的是，生育和性无能问题是在提到特里斯坦的叔叔托比时出现的，托比参加了英荷战争并在比利时的那慕儿战役中受伤，之后他就退役并跟他的哥哥瓦尔特·项狄一起生活。托比·项狄上尉之所以不断在重述他受伤的故事，正是因为其结果——受伤影响了他的生殖和性能力——在整个小说中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值得讨论的问题。托比讲述了敌人的炮弹打来时，他是如何被一面墙的碎片击中，而这面墙本来是掩护他的位置的。结果却是托比叔叔的腹股沟受了伤。这次受伤的后果始终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这次受伤发生在哪里都不清楚。这就引出了一个回荡在整个小说中的问题：“托比叔叔到底是在哪里受伤的？”对于托比叔叔而言这意味着一件事；但是对于他未来的妻子寡妇瓦德曼来说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托比叔叔解释说事情发生在那慕尔，并且还给出了受伤时他所站立的地方的模糊的细节。但是瓦德曼寡妇所感兴趣的只是他身上的哪个部位受了伤，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其后果。

而且，在谈到瓦尔特和之后的托比时，项狄家族的男性生殖能力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质疑。更不要说项狄家族女性的贞操了。但是由于这部小说中的个体人物形象同时也展现着不同的再现类型和语言类型，因此他们的窘境就扩展到了小说自身：小说确实有能力再生产自身，延长自身生命使其超越自身产生时的条件。持否定性意见的批评者，如萨缪尔·约翰逊博士从一开始就质疑这一点：“古怪的东西都不会长久，项狄传也是如此。”但是他的判断已经被证明过于草率。正是由于它的“古怪”，也就是它的独异，《项狄传》才被证明是一种启示，尽管这种启示更多的是对作家而不是对批评家（他们包括歌德、尼采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而言的。

这部小说的古怪之处部分地在于它模糊的结局。小说在斯泰恩去世之前唐突结尾，因此确实可以把小说的结尾看作是作者的死亡。但是这也可能意味着它尚未完成，它还只是一个片段，而不是一部完整的小说。

要阅读小说的结尾，就要发现文本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就像它在其他许多方面做的一样。小说以一则轶事结尾——也就是说，用一则故事的短小片段来结束。这是一个适当的结尾方式，因为整个小说就是由一系列轶事、或者说事件构成的，这些轶事或者事件或多或少地用松散的方式串联在一起。最后的轶事是关于一头公牛的事件，这头公牛属于特里斯坦的父亲瓦尔特，瓦尔特是为了繁殖的目的才养这头牛的，

但是，这头牛似乎没有完成堂区派给他的任务。瓦尔特的牛不能履行堂区的任务，不能帮助村里的母牛生产小牛。人们认为它使得教区的一头母牛怀了孕，但是结果这头母牛并没有（生下）牛犊。这头母牛生育的失败激起了在项狄家的男人们的激烈争论，即谁或者什么应该为此负责：

——报告老爷，奥巴代亚说，镇上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全怪那头公牛——

——可不会有不生小牛的母牛吧？我父亲转向斯娄泼医生答道。

哪有这种事：斯娄泼医生说……

在争吵的过程中，特里斯坦的母亲罕见地露了一次面：

老天！我母亲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呀？——

无非是公牛、公鸡之类的荒诞故事，约里克说，——这可是我听过的这类故事中最好的。

这个问题和约里克的回答可以轻松地应用到作为整体的小说上来。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整体”可以是什么，特别是当与处在独异状态的生命相关的时候。生命——其中包括动物也包括人——的独异能否被吸收进一个富有意义的个体生命故事的总体性中？或者正是将个体生命与其自身区分开来的独异之物的表达（articulation）才使得生命获得了意义，特别是在其片面性中？斯泰恩的故事，既是对自己作为叙事的本质的不断“反思”（这种反思不是以康德的“反思性判断”概念来进行的），又是一项对独异之物的研究：瓦尔特·项狄、托比叔叔和所有对其他人物，包括对叙述者本人特里斯坦的描述都是如此。特里斯坦是所有这些独异前辈们的后人，他把自己分裂成了人物和叙述者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都有同一个名字：特里斯坦。

这个故事用独异的方式跟随并且展现了这些“个体（dividuals）”，这个故事最终以妙语连珠的笑话，一个“鸡和公牛的故事”来结尾。但是这个笑话并不仅仅是在拒绝意义，而是把它转化为表意过程（signification）。读者都希望小说能够并且应该使得一个独异的生命变得整全而且有意义，这则笑话揭下了这种期待的面纱。我在这里是在字面意义上使用“有意义”这个词，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一种期待：个体生命能够把其意义容纳在自身之中——意义充满自身——就像它应该是的样子。事实却是，我



们讲了一个性无能的公牛和想要生育的母牛的故事。这就要立刻去寻找原因，找出谁才是元凶首恶：谁应该为此事负责，是公牛的所有者（瓦尔特·项狄）还是母牛的所有者？这种提问预设了一个不能自我繁殖的生命——就像故事里的公牛和母牛——是有罪的，这种预设来自于生命应该能够不断地自我繁殖的概念，然而，鸡和公牛的故事表明，这种无能不仅仅是不能生育。它的“来生”不只是来自于自身，而且来自于与他者的关系，首先就是与读者反应和产生那些反应的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可以质疑，它们作为一个意指过程它们作为意指过程，被语言多义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并且通过多元决定——所质疑。但是这只有在读者已经准备好并且能够质疑某种特定传统教给他们的期待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期待就是：个体生命的故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个体生命的自我（the Self）是自主和自足的。

结尾的笑话正是要导向对这种对于有意义的生命的期待和它所预设的个体化的自我的反对。“鸡和公牛的故事”，如约里克所言可能是你听过的最好的这类故事里的最好的，因为它质疑了自我繁殖的期待。这个笑话的“代价”并不是说没有代价——所有东西都是荒诞不经的——而是说，一个特定的“生命”是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获得延续的。这里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没有最后的权威。最后的定论根本不是定论（The last word is not a word at all），只是一个笑话。它只是在最靠近现在的意义上才是“最后的”。

在《项狄传》中，所有的人为行动——不论是行为上的还是言语上的——都不停地被打断，这个故事自身起到了这种中断作用，这正是为了探索语言的模糊性，打开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结论始终都是“新奇的（curious）”。新奇是在奇怪、出乎意料和未完成的意义上而言的。新奇的结论中止了小说的情节，但是却没有完成。它们仍然是独异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鼓励读者继续思考和感受，并且通过提问来展望未来。这个问题就是本雅明在他的《讲故事的人》中所写到的那个每一个真正的故事都会引起听众和读者的问题：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译/校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